

· 徽学研究 ·

刘大槐对清代徽州教育的贡献及影响

江小角 王佳佳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刘大槐作为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诗文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多有建树,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文章专门对刘大槐晚年担任黟县教谕,主讲歙县问政书院期间,在安徽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及影响做了分析。指出刘大槐在徽州任职和讲学,不仅推动了徽州教育的发展,而且还沟通了桐城文派与徽州朴学的联系与学术交流,扩大了安徽地域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桐城派;刘大槐;书院;徽州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4)03-0128-06

Liu Da - kui's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on Education in H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JIANG Xiao - jiao WANG Jia - j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Liu Da - kui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ory ,and hav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That was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Liu Da - kui.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discussing Liu Da - ku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nhui in the Qing Dynasty. When as didactic in Yi county and a teacher of Wenzheng academy in She county ,Liu Da - kui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uizhou area ,but also communicated link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ongcheng Parties and Huizhou collative school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Anhui.

Key words: Tongcheng Parties; Liu Da - kui;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education of Huizhou

刘大槐是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被学界尊称为“桐城三祖”之一,是桐城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刘大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特别是其文论思想中的“神气”说,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且成果颇多^②。有关刘大槐主讲书院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③。刘大槐一生先后在山西百泉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和歙县问政书院主讲。刘大槐的书院讲学生涯与其弟子姚鼐相比,时间要短,在书院教育方面的影响,不及姚鼐之大。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刘大槐从67岁才开始书院讲学,教龄较短,且由于他终其一生只任过歙县教谕一职,政治上、学术上影响力有限,头上缺乏吸引生徒归附的炫目光环”^④。但从安徽地域范围来看,安庆敬敷书院和歙县问政书院对清代安庆、徽州等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所书院在安徽教育发展史上极具影

128

①“刘大槐上承方苞,下启姚鼐,被称为桐城派的‘三祖之一’”。参见郭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

②有关刘大槐“神气”说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师承方面,查金萍《学行程朱之后——从接受史角度重论“桐城三祖”与程朱理学之关系》,《朱子学与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二是内涵方面,刘相雨《论“桐城三祖”的作文之“法”》,《第三届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7年;易然《刘大槐散文创作中的“神”“气”论》,《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冯峰《桐城派与徽州朴学》,《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

③关于刘大槐书院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方宁胜在其所著《桐城科举》(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有所涉及。

④方宁胜《桐城科举》,第104页。

响。本文以刘大櫟著述为基础,通过对同时期徽州文人著述、方志史料的解读,考察刘大櫟在徽州的讲学授徒和交游,探讨其对徽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以及对桐城派文学思想传播的作用。

一、刘大櫟生平概述

刘大櫟(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安徽桐城人。姚鼐曾追忆刘大櫟“生而好学,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①。他的曾祖日翟,“明末官歙县训导,乡里仰其高节。其后累世皆为诸生,至大櫟益有名”^②。刘大櫟祖上有名者当属“日翟”,曾任歙县教谕;其余先祖有的仅入诸生之列,杏坛文坛也少有名气。但刘大櫟自幼聪慧,青年得志,在名师指点和乡贤帮助下,名扬京师,“始年二十余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櫟”^③。刘大櫟进京之后,其文广传颂,并被“一代正宗”方苞所赏识^④。据《国朝先正事略》载“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见先生文,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刘大櫟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⑤尽管如此,也未能改变刘大櫟的人生命运。“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⑥。在科场上失意的刘大櫟,时时要面对来自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压力,私塾授徒、讲席书院、入幕理事成为他解决生计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刘大櫟在科举入仕失败情景下谋求施展才华的良好平台。

雍正三年(1725),即刘大櫟首次赴京乡试之前,他在家乡设塾授徒,与姚范、叶酉等桐城地方文士谈学论艺,通过张若矩结缘张廷玉家族。乾隆四年(1739)以前,刘大櫟客游京城,一方面参加科考,另一方面在京城授徒,与沈廷芳、方道希、杭世骏等京城名士均有交往。此后20年间,刘大櫟往来各地,或于家乡设帐课徒,或入幕中校试阅卷,兼主书院,也继续应诏举“经学”,继续参加科考。江南、京城、荆楚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失之科场,收之杏坛,姚鼐在此期间始从刘大櫟学文,后来取得很高成就,被誉为“桐城派集大成者”。

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刘大櫟先后担任徽州府黟县教谕、主讲歙县问政书院,有近12年。他与程瑶田、郑牧、方根矩等徽州学者、文人切磋学问,谈论时势。金榜、吴定、吴绍泽等人,受业于问政书院。此间,刘大櫟还为歙县纂修方志。施教、授业、著书,齐头并进,人生步入辉煌。

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到去世前的9年时间,刘大櫟回到家乡,著文立说,课徒讲学。桐城后辈王灼、方绩等人师从问学;一些昔日生徒还渡江来到桐城,向老师请教问学。刘大櫟对生徒精心辅导、启发奖掖,期盼成才。吴定到桐城拜望刘大櫟,他犹力疾而为讲读,并出己文使商

定去留。其时,姚鼐也辞官归里,正处于人生转折关口,数见老师,刘大櫟“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⑦。“姚姬传实从其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⑧。由此可见,刘大櫟对桐城派文学理论的传承发展贡献尤大。

在桐城籍桐城派作家中,参加科举考试,有顺利取得功名者,如姚鼐、吴汝纶等人,也有如刘大櫟一样屡试不中者,如方东树、戴钧衡、马其昶等人。但在地方文人乃至当时名士之中,刘大櫟凭借个人才华,影响许多人成长成才,享有较高的声望,为时人所尊重。刘大櫟通过私塾授徒、书院讲学等途径,培养出像姚鼐等桐城派大家,这些都为后世桐城派名家树立了榜样。晚年刘大櫟把培养生徒作为自己人生寄托,也最终结出丰硕成果。可以说教育活动是刘大櫟人生取得成就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同生徒、友人的讲论中,他的文学思想内涵不断丰富,诗文创作水平不断提升,人才培养队伍逐渐壮大,在文坛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对桐城派文学理论的传播和创作队伍的扩大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刘大櫟在徽州施教的主要内容

刘大櫟在徽州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在任教谕之职,开展教学管理和任书院主讲,传道解惑,培养人才两个方面。

第一,任职黟县教谕。乾隆二十四年(1759),刘大櫟受黟县知县孙维龙的邀请,赴黟县任教谕一职。他如斯描写自己的心情“惨淡趋程急,崎岖怨路长。青春成过客,白首向殊方。志业全芜没,朋交半死亡。更闻猿啸苦,清泪不成行”^⑨。路途崎岖,年华已去,友朋亡故,举业芜没,可以想象刘大櫟当时内心多么悲凉。但由于黟县知县孙维龙倾心发展文教事业^⑩,诚恳邀请刘大櫟到黟县任职施教,所以刘大櫟一到黟县就迅速调整心态,积极了解黟县民风民俗,帮助黟县发展教育,努力培养生徒,同地方名士谈学交游,为黟县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①姚鼐《海峰公传》,载《桐城陈洲刘氏支谱》卷13,民国五年(1916)刻本。

②③⑥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5,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76、13376—13377、13377页。

④袁枚《随园诗话》卷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26页。

⑤⑧李元度纂、易孟醇点校《国朝先正事略》下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02页。

⑦刘大櫟《刘大櫟集·刘海峰简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21页。

⑨刘大櫟《刘大櫟集·赴黟县》,第587页。

⑩孙维龙,字普田,寄籍宛平,先官安徽黟县知县,创立书院,延请刘大櫟教士,又建石桥于鱼亭镇,通浙、楚往来,行旅称之。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9,第13495页。

在教谕任上,刘大櫟同程瑶田、方根矩、汪梧凤等学者文人,切磋学问,谈论时势,关心民生疾苦,情谊密切。特别是把对朋友、弟子的热爱之情融入到教学管理和教育实践之中,勇于担当起培养徽州人才的重任。

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清代著名学者,徽州朴学代表人物之一。程氏擅长训诂,主张“用实物以整理史料”,开启了传统史料学与考古相结合的新路。其在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农业种植、水利、兵器、农器、文字、音韵等领域的成就较为突出,著有《通艺录》等。程瑶田和刘大櫟互相切磋文章,刘大櫟的古文创作理论也影响了程瑶田。程瑶田主张作文“要言之有物”,曾说“谈理必步趋儒先,树义必元本经训,修辞必出入于古文大家”^①。可见在作文修辞上,程瑶田是推崇古文大家的。对待后辈的学习,程瑶田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目前最要紧者,每日读经书若干字,读古文若干字,读时文若干遍”^②,足见他重视古文学习。程瑶田在自己文集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诸家评论,他提到了“刘海峰先生九事”^③,保留了老师对古诗的评价。这既反映了刘大櫟的诗学观点,又是再现刘大櫟对生徒培养的原始记录。

方根矩(1729—1789),又名矩,字晞原,歙县诸生。为文用意高远。其学宗婺源江慎修,其文宗桐城刘海峰^④。刘大櫟称赞他是歙之贤者,“志在复古,独从余相为副切。遵唐、归之遗轨,而不惑于世俗之趋尚”^⑤,并且不怕世人嘲笑而易其所守。方根矩学习古文用力尤多,连戴震都称赞叹服。戴震在《与方希原书》一文中说“得郑君手札,言足下(晞原)大肆力古文之学。”^⑥戴震本人虽然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但对方晞原学习古文也提出了要求,“仆尝以为此事(指学习古文)在今日绝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渐去古人远矣。”^⑦刘大櫟还与方晞原、程瑶田等友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同游黄山,撰写《游黄山记》,详述出游路线、沿途风光景色和自己登山感受。

汪梧凤(1726—1772),字在湘,号松溪,乾隆举人。师从方黎如、江永,学问渊博。戴震、郑牧、金榜与其交谊深厚。著有《松溪文集》,刊刻传世。刘大櫟的“神气”说理论,对汪梧凤产生了积极影响。刘大櫟曾点评汪梧凤的文章为“事奇文亦奇,神气摹绘一一胎息史迁”^⑧。汪梧凤在《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一文中,情真意切地记述了与刘大櫟的交往和学习,“吾数人乃得师事先生,数闻论议”还经常讨论“古今得失是非”^⑨。此外,在刘大櫟担任教谕期间,不少徽州学子前来拜师问学,所言“数人乃得师先生”,指的应该是郑牧、吴绍泽、方根矩、金榜、汪梧凤、程瑶田等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刘大櫟在黟县教谕任上,与地方文

人、生徒讨论学术与作文,通过对前人诗文的评点等形式,开展教学。虽然施教方式和内容不比书院完善,但对徽州学人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古文创作上的影响,十分明显。

第二,主讲歙县问政书院。在担任黟县教谕期间,刘大櫟因巡抚檄令主讲安庆敬敷书院,约两年左右时间。敬敷书院是当时安徽省内地位最高的省级书院,没有科甲功名的刘大櫟,能够成为书院主讲,是对其才学的充分肯定。乾隆三十二年(1767),刘大櫟辞官后,应邀赴歙县主讲问政书院。歙县“问政书院有二:一在县衙内名宦祠后,其始无考。仅屋三楹,奉程朱木主。一在县学东江家坞”。乾隆三十五年(1770),知县张佩芳以名宦祠后之书院,规制不称,无以容学者,将卜地为之,附贡生程光国等捐建^⑩。而这一时期,刘大櫟正好在问政书院主讲,问政书院扩建,广纳“学者”,与刘大櫟的积极倡导有很大关系。刘大櫟《问政书院记》,非常清楚地介绍了问政书院的由来与发展。

歙县本有书院,但是屡屡迁移,后建于紫阳山上,即为紫阳书院。紫阳书院的地位是“新安一郡之学”,为州府级别的书院,当时休宁县有海阳书院,而歙县还没有自己的县级书院。知县张佩芳来到歙县之后^⑪,重视发展

^①程瑶田《丰南留别生徒赠言》,《程瑶田全集》第1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05页。

^②程瑶田《杭州留别洪生受嘉赠言》,《程瑶田全集》第1册,第107页。

^③程瑶田《刘海峰先生九事》,《程瑶田全集》第4册,第148—149页。

^④姚鼐《惜抱轩全集·方晞原传》,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10页。

^⑤刘大櫟《刘大櫟集·方晞原时文序》,第97页。

^{⑥⑦}戴震《东原文集》卷9《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4、374—375页。

^⑧汪梧凤《松溪文集·金华社董叙传》,清不疏园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⑨汪梧凤《松溪文集·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第4页。

^⑩吴景贤《安徽书院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⑪张佩芳,字荪圃,山西平定州进士。乾隆中任歙县知县。新学宫,兴水利,修庆丰塌,黜淫祀,除横山妖石,慎狱勤学,增惠济仓、惠济堂。初课士斗山亭,继创问政书院,延刘大櫟教士。有(又)加调合肥,升寿州知州。建预备仓80间,延梁巘主讲循理书院,士风大振。擢泗州直隶知州,赈水旱,请放本色,乞罢南门关税,开天然闸。著有《希音堂集》、《陆宣公文集注》。参见《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149《职官志·名宦》,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778页。

文教事业,设问政书院,“士好学而能文者,盛礼以招之使来,于斗山之亭,日课月校,已三年矣”,结果“多才济济,愈益奋兴,其肄业而举于乡者,遂数人”。刘大櫟主讲书院后,生徒日众,为进一步满足教学需要,张佩芳与程光国等捐输广厦十余间,为诸生诵习之地,凡是紫阳书院不及收者,咸得归之问政^①。问政书院与紫阳书院相得益彰,二者从不同层次为徽州地方文士和生徒提供交流学术与学习知识的场所。

吴定、金榜、吴绍泽等人这一时期受业于刘大櫟。“吴定,字殿麟,歙县人。举孝廉方正。……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集》六卷”^②。吴定师从刘大櫟,主要学习古文文法,吴定曾说“予昔学文于海峰先生之家塾,因得与滨麓交游”^③，“其后先生退休乡里,……予既孤,乃渡江就先生之庐请益,而斯时王君滨麓亦执弟子礼,受学于此”^④。金榜(1735—1801),字辅之,歙县人。清代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曾拜江永为师,与戴震、程瑶田同学,又师从刘大櫟学习古文。乾隆三十七年(1772)中状元,授翰林院编撰。著有《礼笺》三卷,令戴震叹服^⑤。刘大櫟曾与之同游黄山,并为其祖父撰《金府君墓表》。吴绍泽(1736—1788),字惠川,与戴震、金榜、程瑶田等相友善。后来跟随刘大櫟学习古语法,“师事桐城刘海峰先生学为古文,……惠川之辞有欧阳子遗音”^⑥。他的古文创作也深得刘大櫟喜爱与赞赏,“绍泽恂恂为儒者,明圣人之道,能文章”^⑦。

刘大櫟在问政书院主讲四年,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与积累,他对书院的建设与课学,以及书院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皆有思考,并集中反映在《问政书院记》一文中。一是强调立学的意义,旨在使得“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无一人之不同归于善也”。刘大櫟将“善”作为立学的原则,认为“善”要体现在“和其心”、“探其义”、“养老以深其爱敬”、“乡射以正其容止”、“饮酒以劝其温恭”、“受成献馘以亲其武勇”等方面。这一“同归于善”的立学主张,实际批评了以词章、训诂为进取之阶的不良学风。二是强调如何施教。他认为在学习方法上,应“循序优游,使深入其中而不自觉也”。既要循序渐进,又要润物无声,强调学习境界体验。三是肯定书院设立的必要性。他说“于学为近”,“非孔子之庙所可兼”。在中国古代教育活动中,孔庙不仅有祭祀孔子的功能,同时兼作教学场所。但孔庙的设立并不能取代书院,因为书院“群聚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就算学习那些“训诂、词章之末”,也并非是对古人的重复。设立书院能够“兴起后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四是强调书院设立的条件。他认为建立书院需要有时、有地、有官、有器、有朋、有事等六大条件。

刘大櫟书院“六有”说,也是基于“非孔子之庙所可兼”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虽然他在《书院记》中,并未充分论述“六有”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推测大致范畴,其中前三条又尤为重要。“时”指时代与时机,书院是适应这一时期教育活动需要而产生的,孔庙不能完全取代它的功能。“地”是书院设立的基本条件,即场地,所以他在《书院记》后面的文字中,着重介绍了问政书院初设之所和后来扩建的情况。“官”指官方的支持。书院在清代官学化特征十分明显,虽然很多书院的建立有民间性质,但是官方已经深度参与到书院的建设、管理、监督之中,从书院建设资金筹措到书院日常运转,从书院讲席选择到书院日课月考,无不体现官方参与的色彩。刘大櫟“有官”说,准确地概括了清代书院官学化的特点。此外,刘大櫟还在其他文章中,就如何治学、如何学习,有一些论述。例如,他提倡为学目的应“本仁蹈义,通古宜今”^⑧,而不能以科名为学;若这样,则“徒自为腐败而已”^⑨。他还主张学习的根本要义是“知性、尽心、立命”^⑩。

在徽州讲学10余年,是刘大櫟40多年在外奔波生涯的最后里程,从教事业取得丰硕成果,诗文风格发生转变并日臻成熟。姚鼐曾说“海峰先生诗,初尤有摹古之痕,入黟后所作,如鲲化为鹏,超然万里矣”^⑪。同时,生徒日众,成名者居多,使刘大櫟颇有成就感。在徽州生活10余年,刘大櫟对徽州的山水景色、文人学子颇有感情,他曾称赞黄山是“岩峦万象呈”^⑫。参与编修《歙县志》,更使他深入地了解了徽州的旧闻掌故、风土人情和山川形胜。我们纵观桐城派发展史,特别是在桐城派作家群体中,那些科举仕途不得意的文人学士,大多有着相同的

①刘大櫟《刘大櫟集·问政书院记》,第310页。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5,第13396页。

③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卷6《王滨麓古文序》,清光绪十三年黟县李氏重刊本。

④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卷6《王滨麓初集诗序》。

⑤王钟翰《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32—5533页。

⑥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卷10《吴蕙川墓志铭》。

⑦刘大櫟《刘大櫟集·吴节母墓志铭》,第277页。

⑧刘大櫟《刘大櫟集·陆宣公文集注序》,第45页。

⑨刘大櫟《刘大櫟集·张俊生时文序》,第104页。

⑩刘大櫟《刘大櫟集·方氏学舍记》,第328页。

⑪姚鼐《跋海峰先生诗》,《刘大櫟集》附录四,第629页。

⑫刘大櫟《刘大櫟集·题巴子籍梦游黄山图二首》,第606页。

人生轨迹。早年私塾授徒,参加科举;中年乃至晚年,迫于生计,奔波各地,或讲席书院,或入幕主事;晚年归里,著述写作,整理诗文和乡邦文献。而刘大櫟是这一轨迹的最早践行者,他在徽州地区讲学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也奠定了其在桐城派发展史上的地位。刘大櫟一生虽无功名,但倾心教育、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并通过学生进一步弘扬自己的文论思想,这些都为后世桐城派作家的成长、桐城派文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和导向作用。

三、刘大櫟在徽州施教的影响

刘大櫟讲学徽州,对徽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安徽区域文化的交流、桐城派文学思想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 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发展

刘大櫟在黟县同地方文人论学,在歙县主讲书院,广收生徒,培养人才。吴定曾说“黟士至今感诵先生教育之仁不息”^①。徽州学子跟随刘大櫟学习古文、诗词,之所以“至今感诵”,与刘大櫟在徽州讲学付出的心血不无关系,许多生徒对老师的教育与帮助,无比感激。吴定评价其师“海峰先生才高而遇穷,于诗靡所不工,而古诗尤超越国朝诸贤之上”^②。这些生徒,不仅承续师法,也有所创新与发展。例如,陈兆麟评价吴定时说“国朝古文之盛,义法莫如方侍郎,才调莫如刘学博。今先生兼其美,而卓然自成一家”^③。

在书院设置问题上,刘大櫟《问政书院记》曾指出书院与孔庙的不同之处,并非简单重复前代的观点。吴定《重建古紫阳书院记》继承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近代书院之设”,“非复三代学校之旧”,也不是“宋四大书院之旧”^④。在诗学上,程瑶田曾说“诗道性情者也”,现在为诗之人何尝不去模仿汉魏格调,仿袭盛唐声律,但是并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性情之故”^⑤。“诗道性情”之论,是从吟诗者性格情感角度对作诗要求的论说,与刘大櫟“文章者,古人之精神所蕴结也”^⑥的观点一脉相承。在对科举制度弊端问题的认识上,程瑶田认为学者“视制义为掇取科名之径术”,于是“执经就传,皆不首其义”,“徒记诵其辞章”,所以“制义不足以征士之才者”^⑦。这与刘大櫟对科举时文的批评相似,除了在《问政书院记》中对学风不正提出批评外,刘大櫟还曾说“今之学士大夫顾有所不逮”,是由于“科举时文之习,诳诱于其前”^⑧。

(二) 推动了清代安徽区域文化的交流

乾嘉时期,姚鼐就曾指出“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⑨。晚清时,国学大师吴汝纶曾对安徽区域文化做过一个总结“经师若婺源江氏、休宁戴氏,文章若桐城方、刘、姚氏,皆所谓特立于一时”^⑩。可见姚

鼐、吴汝纶认为安徽地方学术以经学、文学著称,在经学方面,有婺源江氏、休宁戴氏双峰并峙;在文学方面,则是桐城派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这里的婺源江氏就是江永,他开一代乡邦学术风气,推动古学复兴的学术潮流^⑪。而桐城与新安两大区域文化的交流,在江永时代就已经开始,他游历京师时,拜会当时已是三礼馆总裁的方苞,方苞与其讨论经学方面的问题,方苞“见则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中数事为问”,江永“从容置答”,方苞“乃大叹服”^⑫。刘大櫟曾为江永作传,感叹他的学术涉及领域“可谓多矣”。同时,对江永在朴学考据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刘认为使二千余年“如蒙云翥”的学者,“直至今日而始明”^⑬。刘大櫟在传文中,一方面肯定江永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徽州诸君对刘大櫟的学识表示认同,为传播桐城派古文减少了阻力,创造了条件。学界历来都把徽州看作是“朴学”故乡,然而在戴震入都前后,徽州青年才俊中盛行的却是一股“古文”学风,这股风气正是刘大櫟被徽州诸君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乾隆时期,汉宋两派学术之争渐起,但是从刘大櫟到徽州讲学情况来看,两派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学术见解层面,而相互间的思想交流与友情交往并无妨碍,也没有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个人相互之间的友好。刘大櫟弟子中,后来有人也成为朴学大家,例如程瑶田,但在文章创作上,仍以古文为宗。而刘大櫟的徽州弟子群体中,很

①吴定《海峰先生墓志铭》,《刘大櫟集》,第623页。

②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卷6《海峰夫子诗序》。

③陈兆麟《跋紫石泉山房文集》,载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

④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卷8《重建古紫阳书院记》。

⑤程瑶田《修辞馀钞·方晞原诗叙》,清嘉庆八年通艺录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5册,第684页。

⑥刘大櫟《刘大櫟集·见吾轩诗序》,第79页。

⑦程瑶田《修辞馀钞·胡在元时文序》,第713页。

⑧刘大櫟《刘大櫟集·严遥青诗序》,第74页。

⑨吴定《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志铭》,载钱仪吉纂《碑传集》卷50,《三十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第27册,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4—5页。

⑩吴汝纶《安徽通志序》,《吴汝纶全集》第1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96页。

⑪陈祖武《〈皖派学术与传承〉序》,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5页。

⑫李元度纂、易孟醇点校《江慎修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下册,第1031页。

⑬刘大櫟《刘大櫟集·江先生传》,第166页。

多人同时也拜师江永、戴震,学习经学,如金榜、汪梧凤、吴绍泽等^①。由此可见,当时吴定等人治学的两大内容是经学与古文辞,这些主要由江永、戴震与刘大櫟来传授。这些弟子学有所成,促进了两大学派的形成与壮大,使清代安徽两大区域文化日趋繁荣,并不断扩大影响。

(三) 传播了桐城派文学理论

乾隆中叶之前,桐城派虽然还未正式扛旗立派,但是经过戴名世、方苞等人的努力,到刘大櫟立足文坛的时候,桐城派在古文理论、文章创作实践上,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规范、相对完备的主张以及提倡雅洁为特点的文风。刘大櫟在学术上强调“义理、书卷、经济”,文章写作主张重视“神气”、“音节”与“字句”三大要素。吴德旋在《初月楼文钞》中说“国朝诸名家文则别自为卷而其体仍以类相从,盖我朝自李厚庵创为复古之学,其言固与汉人说经之文相表里。而刘海峰、龚东皋得古文遗风,其言之美亦不减李氏。后进安于所蔽反目为怪迂而不足道,有识之士能无发愤而兴叹欤?虽然,此非仅学者之过也,时之所以求之者不存焉,则以为无用而弃之,宜也。予之乖于时久矣,敢谓有人焉能信而从之者乎?又岂敢谓予之能有乐于是乎,知其难则可贵矣。”^②在刘大櫟的感召与训导之下,一批徽州文士从事古文创作,他说:“甚矣,文之难言也!欧、苏既没,其在明代,惟归氏熙甫一人。然熙甫求为进士而不得,劳其心于八比之时文,而以其余力作为古文,故其置身不及唐以上。然则,古文之衰五百余年矣。在湘乃独为人世之所不为,可谓魁杰有志之士也。”^③歙县人鲍桂星,邃于文学,“少从吴澹泉定学诗古文,因以溯刘海峰。后师姚姬传,于为诗,力守师说。姬传称之曰‘是能合唐宋之体而自成一家人也’”^④。鲍氏也认为自己作文习诗之初,深受刘海峰先生的影响,他17岁从吴澹泉夫子游,而“夫子为桐城刘海峰先生高弟,古今文宗法甚峻。余始受绳削,颇苦之,然得

窥词章门径自此始”^⑤。刘大櫟慨叹古文之衰五百余年,而能够有汪梧凤(在湘)这些有志之士承继古文事业,独为人世所不为之事,让刘大櫟看到了古文振兴的希望。

总之,刘大櫟在徽州讲学活动,既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又对徽州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有清一代,桐城与徽州之所以成为安徽区域文化中的两大亮点,在全国广受赞誉,这些与刘大櫟、姚鼐等桐城派作家不断传播传统文化,重视发展地方教育,摒弃学术偏见,勇于沟通交流,善于和他乡有识之士切磋探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桐城派绵延几百年而不衰之真谛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11BZW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江小角(1963-),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佳佳(1990-),男,安徽淮北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江锦波等《江慎修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②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4《四书文选序》,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③刘大櫟《刘大櫟集·汪在湘文序》,第55页。

④李元度纂、易孟醇点校《国朝先正事略》下册,第1249页。

⑤鲍桂星《觉生自订年谱》,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6册,第592页。